

封面人物访谈

蜉蝣天地话沧桑

——专访跨文化思想家资中筠先生

时间：2020年9月

参与者：著名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 资中筠（以下简称“资”）
《跨文化思想家》主编助理、法学博士 张振华（以下简称“张”）

思想家简介：

资中筠（1930—），女，湖南耒阳人。当代著名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父亲资耀华，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并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进修，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金融家、银行家，也是金融学界的泰斗及货币史研究的大家，有《货币论》《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中国货币史资料》等著作传世，“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母亲童益君，开明之士，在实业救国、办学育人等领域均有建树。

1947年，资中筠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并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于1951年毕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七十年代末转入学术研究，先后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历任副所长、所长等职务。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中美关系，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也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改革开放后曾多次访美，从事学术交流，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及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担任研究员。

先生曾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和中华美国学会，并担任杂志的主编与美国学会的常务理事；创建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担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先生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仍继续学术研究与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主要著作：《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1945-1950》《资中筠集》《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此书的初版与二、三版题为《散财之道》《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二十世纪的美国》《美国十讲》《蜉蝣天地话沧桑：资中筠九十自述》等。随笔集：《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资中筠自选集》（五卷本）《老生常谈》《有琴一张》等。译著：（法）巴尔扎克（H.de Balzac）的《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美）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啊，拓荒者！》，（英）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的《哲学的慰藉》以及（美）罗伯特·沃勒（Waller.R.J.）的《廊桥遗梦》。

一 底色、回归与启蒙

张：资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够拨冗接受采访。您已90岁高龄，却依然文思泉涌、笔耕不辍，新近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蜉蝣天地话沧桑：资中筠九十自述》一书。值得祝贺的同时，也令我们这些后学晚辈敬佩不已！于此，能不能请您先谈一下，这本书的写作缘起、初衷以及特色呢？

资：好的。开始起意写一部回忆录已经多年，其间受到许多朋友的“怂恿”和鼓励，特别是自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问世并得到广泛的读者好评以来，一时间出版人和媒体纷纷上门，或约稿，或提出为我做类似的口述历史。根据我的习惯，文思时常是在写作中汨汨流出，并有自己的遣词造句的风格，还是想趁着仍有精力时自己写，而不是口述。但是，随时想写的东西很多，加以近年来似乎越来越忙，往往身不由己，很难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写过去的事；另外，还由于自己的惰性，无意识中就拖了下来。几年前，读到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

作为同代人，感触良多，又唤起多少几乎遗忘的往事，这对我是一大激励，觉得来日无多，非下决心完成不可了。2014年，访问台湾，有幸会晤齐邦媛先生并共进晚餐，相见恨晚。对加紧回忆录的写作又是一次鞭策。现在终于大体完成了。说是“完成”，其实也不准确；越写，想起的细节越多，后来的时间不少是花在斟酌详略上。若要继续写下去，不知伊于胡底。

我本一介书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没有什么值得传世的事迹。但是，我所经历的时代却是大起大落，常有惊天动地之事，个人命运也随之浮沉。我常说我这一代人人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其实何止我这一代，几代中国人都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动荡中成长、生活。我们的生年都可以用“事变”来标志：我父母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生于1900年，就是“庚子之变”那一年。他们青少年时遇到皇朝覆灭、民国诞生的大变局，他们的教育始于私塾，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学东渐之时。我生于1930年，第二年就是“九·一八”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正是小学二年级暑假，第二年就遭遇校长被日寇特务刺杀的惨剧，终生难忘。抗战八年，我在天津沦陷区读完中学，亲历抗战胜利的狂欢与随之而来的失望。上大学时适逢三年内战，继以政权易帜，国体变更。以后即使你没有亲历战争，却也是政治运动不断，免不了腥风血雨，连我的下一代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浩劫和随后的巨变。所以，讲家史和个人历史总离不开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我从大学毕业以后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国际领域，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年代有难得的国外见闻和与国内外各色人物的接触，从这个角度讲，我个人的特殊经历也许可以收从一滴水看大海之效。

西谚云：“人生自四十始”，我却是自六十始，甚至更晚。本来既无案牍之劳形，又无“课题”之催逼，清心寡欲，足以颐养天年；有书有琴，怡然自得。但是，总是有一种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情结。在这个物欲横流、战火纷飞、杀戮手段日益升级，人性中“恶”的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的世界上，人类将伊于胡底？陶醉在“崛起”的豪言壮语中的吾国吾民何处是精神的家园？身居陋室，俯仰古今，心事浩茫，对斯土斯民，乃至地球人类，难以释怀，如鲠在喉，不得不发出声音。却不意引来了不少读者和听众，不知不觉结识了各种年龄的新知，既有才识令我心仪的长者或同辈，也有好学多思的青年学子。特别是乐民先我而去之后，这些忘年交对我照顾有加，在精神上能够相通慰藉，免我孑然一身的孤寂；而纷至沓来、应接不暇的各种约稿和活动的要求，使我生活充实而且感到还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写作这本回忆录，也算是对自己、对友人、对斯土斯民的一个交代吧。

如果这说这本回忆录有什么特色的话，首先是作为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回顾所来路，是一段否定之否定的痛苦的心路历程，既是个人的特殊经历，也有普遍性。今天的青年和外人总是很难理解那个年月的中国读书人的表现和言行，更无法深入了解其内心深处的起伏、转折和纠结。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每个阶段表现不同，失落和回归的程度各异。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上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连第一阶段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余生还有精神家园可以回归，这是拜我的父母和青少年的师长所赐。

我的读者当然是在中国大地，但是由于我自己的拖沓，等到书能付梓时，却遇到了不利的环境，自己感到已来日无多，于是接受朋友的建议，不论如何先让它见天日，就有了这本繁体字的香港版。我还是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内地的版本。

张：您根据自己一生的经历，将本书分为四大部分，实际上这也是您一生的四个阶段：底色、修炼、转折和回归。其中，“底色”的形成，是您的精神故乡，也是您的“回归”之处。那么，您能否谈一下这种“底色”是如何形成的？与哪些因素有关？具体而言，“底色”的主要内涵或者构成又是什么？

资：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具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时代的大背景、大环境，以及家庭、师友、学校无形的熏陶，形成了我的“底色”。总括起来就是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淑世情怀，在新时代中加上融入世界潮流以求民族振新的追求，也在我的成长期打下深深的烙印，形成不言而喻的终极关怀。

其中，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是我们这代人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这类文字的熏陶也是形成我的“底色”的一部分。

家庭的熏陶，特别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是在母亲的严加管教下成长起来的。所谓“严”，不是严厉。她极少疾言厉色，打骂之类，我几乎没有挨过打。她注重“说服”，而且很开明；如果不服，允许辩论。这里的“严”，主要是指家教比较严，对于读书、举止、作风都有约束。与此同时，我母亲非常痛恨趋炎附势，又坚持“无友不如己者”，对我交往的同学总要做一番了解，家境贫寒而品学兼优的她都欢迎。有一个同学家里是开跑马场的，平时比较好打扮，和我这种家庭不一样，母亲就不喜欢我与她深交。另外，母亲所信奉的两句话，对我也影响很大。一是“成事勿谏”，一是“堕甑不顾”，都是指已经不可挽回的事，就不要再做无效的争取，或无谓的悔恨。这一影响使我后来经历一些不如意事时能豁达处之。父母身上所体现的自强、爱国、理性、诚、信、蔑视权贵、崇尚学问，厌恶纨绔子弟等等，都在无形中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性格，构成了我的“底色”。但是，母亲那种处处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助人为乐和牺牲精神我确实也没有能继承于万一，我大概只能做到父亲那样消极的清高和洁身自好。

当然，我的养成教育、人格底色的形成，除了父母言传身教之外，在历史大背景下，我出身的那个阶层中耳濡目染所产生的无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从我外祖父到我舅舅和父亲，所处的时代是最后一个皇朝气数已尽之时。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规律是，每当此时就出现“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直到有一位强者打败各路英雄，再建立一个皇朝。而这一回，他们所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几次惨败于列强之后，整个民族良心震撼，特别是士大夫精英阶层意识到不是改朝换代的问题，而是民族存亡的问题，风起云涌的不是逐鹿的野心家，而是各种谋求救国之道的思潮：“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宪政救国”，直到“革命救国”。更重要的是，这批人已经痛苦而深刻地意识到本民族的弱点，目光向外，探索列强之“强”在何处。

张：记得您在书中提到，对于“底色”的回归，实际上是“因病得福”，促使您最终决定辞去对外友协的工作，转到国际问题研究所，从而开启了“五十而志于学”的学术研究之路：

重温了坐图书馆之乐，有了第一次赴美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出版了您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继而李慎之先生从国际问题研究所挖到社科院的美国研究所，并创办了《美国研究》。从此，您在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领域深耕细作，几十年如一日，在学术研究之中回归到您的“精神故乡”。那么，您能否结合美国研究所的情况谈一谈，当时您为什么愿意从国际问题研究所调去美国研究所呢？

资：做学术研究是我的选择，但是研究美国最初是被分配的。美国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我没有参与创建。李慎之把我调去是要我担任副所长，而且正是以这个名义才使国际问题研究所放人。根据中国人事惯例，人家有“升迁”的机会，就不好阻挡了。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郑所长在决定放我之前，还找我谈话，说本来也愿意提我为副所长；这样，我是否可以留下不走，我当然不会接受。我想这也是那一代老干部“礼贤下士”的一种姿态，表示他已尽力挽留，并不一定当真。

我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初衷是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后来终于被说服接受了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的职位，是因为我也受到那个时代精神的激励。社科院当时是推动各种新思想的先锋，对于我来说，李慎之本身就是那种“时代精神”的化身，代表了一种新式的领导风格。他反复强调，我们所做的是一种新的“开放”中国的努力，我们将携手建设一个新型研究所和一个“美国研究”的学术新领域。他还说，如果在中国创立了“美国学”这样一个学科的话，你就算“祖师爷”。这只是一句玩笑话，我不会当真。但当时真以为可以对中国的改革大有作为，就同意了，只是提出条件：一不管人事，二不管财务，只负责学术。李慎之一口应承。他本来就“大权独揽”，美国研究所完全是从无到有，所有人员都是他亲自招来的，我到来时已经差不多满额。另外，还有一位副所长专管行政。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提出的条件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学术是与人才分不开的，只问文章不问人，是自欺欺人，接下来就有评职称问题、工种的分配问题、出国机会问题，等等。在李慎之的羽翼之下，一切由他决定，短期内尚可。不久，他升任社科院副院长，主管所有国际片的八个研究所，虽然一段时间还兼任美国研究所所长，势必不可能多管具体事，我的担子渐渐重起来，烦恼也多起来，此是后话。

在我调到社科院之前，李慎之因准备到美国开会，找我写过一篇有关台湾问题的论文。他有一些想法，与我的想法合拍，我们讨论了几次，拟出大纲，就由我执笔，这方面的原始资料我掌握最多，这也是他找我的原因。当时我还在国际问题研究所，是利用业余和周末时间完成的。又应他的要求，写成英文稿，题为《今后十年的台湾》。后来，中方因故决定不参加此会，老李把书面论文寄了去，引起较大反响。我之所以要求进入学术领域，是不想再给领导当“笔杆子”，或做翻译，而想做一些自己独立的工作。这回又似乎落入原来的套路。那次会议固然邀请他一个人，但是这篇文章是我执笔的，观点是我们共同的，有我许多心血和大部分的劳动。于是我提出应算我们两人合作的文章，尽管我不参会，但我要署名。他似乎有点意外，不过还是同意了，他的名字当然放在前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为自己“争名”，那时还没有著作权的概念。我已经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专著即将付印，不一定在乎多一篇文章在我名下。但是，我实在不愿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争的不是名，而是独立。特别是我已决定调到他手下工作，先要确定工作关系，不论名义上职务是什么，不能又成为一名得心应手的“外事助手”，而要做一个独立的研究人员，这是我当时真实的心理活动。

另一件事是关于翻译的问题。我发现他调我去有一点“私心”，就是仍希望时不时地依仗我为他做一些翻译。他本来英文很好，完全可以交流自如，但是要谈复杂的问题当然还是讲中文更达意，于是很自然地把我作为语言的“拐杖”。我当然不愿意再落入此“陷阱”。于是下决心找机会直言相告：我之所以坚持到研究机构就是厌倦口译这一职业，寻找独立的表达空间。他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后我如果想请你帮忙翻译就免开尊口”。我直截了当

说：“是的”。他显然有不悦之色，这是可以理解的。无论从级别还是资历，我都差一大截，这样生硬地直接拒绝领导也不多见，何况我还是他下功夫“挖”来的。不过，老李到底不同于一般官僚，自此之后，他尊重我的意见，再没有叫我做翻译，而且我们之间也没有因此有任何芥蒂。这次谈话的直来直往也奠定了以后我和他之间坦率讨论问题的风格。

我与他共事，包括两人都退休以后继续交往近二十年，在二十年中既有耳提面命，又有平等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甚至争论（以我的身份可以算是顶撞）。我本性是喜欢说理的，在长年被迫和自我钳制之后，终于可以没有顾虑地表达，心情无比舒畅。无论是何种形式交流，都使我深受教益和启发，也处处感受到他的思想、眼光之异于常人之处。我对他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也并非在所有的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但是我最初对他的印象始终如一：襟怀坦荡，议论横生，总是单刀直入，很少拐弯抹角，时常一语惊人，发人之所未发。他也是少有的从不跟我说“要好好改造思想”的领导（另一位这样的领导是李一氓）。相反，他在对我有些了解之后，曾对我说，你应该相信自己决不会不爱国，决不会立场不坚定，你只要把你所想的写出来，就是好文章。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习惯于“带着镣铐跳舞”的我真有豁然开朗之感。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根本取向。我不但洗尽了那种不自觉沾染上的八股文风，而且终于摆脱从大学毕业前夕就开始的永远改造不好的原罪感，得以回归常识，回归自我，进入今天的境界，是受惠于他。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关键时刻对我的点拨起了“再启蒙”的作用。

张：说到“启蒙”以及“再启蒙”，我注意到，您曾在多个地方和多篇文章中都谈到过这个话题，甚至将自己的余生称之为“自我启蒙与推动启蒙无尽期”。那么，您能否再为我们讲一讲，什么是“启蒙”？当下的中国，为什么需要“启蒙”或者“再启蒙”？

资：我先讲一下什么是启蒙。对于这个问题，康德有过非常经典的回答。他认为，所谓启蒙，“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就是“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换言之，启蒙就是指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回归常识、事实和逻辑；就是打破迷信，回归理性，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在这里，启蒙的对立面是蒙昧，与启蒙相反的是颠倒黑白和不顾逻辑。

有些人不同意启蒙。在他们看来，启蒙就是先把别人说成是愚昧的，自己是聪明的，然后就是去给人家启蒙。因为有这么一种观念在里面，所以就对启蒙很反感。实际上，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从方式上讲，有自我启蒙，也有相互启蒙。但是，启蒙的意思不一定非得是谁比谁特别高明，然后由我来启你的蒙，而是说人们常常处于一种比较愚昧的状态，需要想明白，有时靠外力，有时自己也可以给自己启蒙，人与人之间也可以互相启蒙。就是说原来没懂的道理，忽然一下豁然开朗，懂了。为什么会懂了呢？也许是看到一篇文章，或者是读到一本书，或是听到有一个人讲话，发现事情原来是可以这么看的，原来我这么看，这个角度是不对的，这就是启蒙。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启蒙）还一直存在呢？因为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被愚昧的，我们是处于愚民教育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民族，所以启蒙的任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还是很重要的。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忽然觉得自己有所悟，对一些问题明白起来，意识到自己原来非常迷信、非常愚昧，有这样一个过程，也不是一朝一夕达到的。对很多问题都慢慢地明白起来。那么你自己了解到了，你自己见到了光明，你就特别希望和别人分享。当你发现别人还在那糊涂着呢，你就特别希望他也弄明白这个事，这就叫做启蒙。

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蒙昧的时代，被剥夺了了解真相的权利——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需要启蒙，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

首先，必须要了解真相。我本人近年来读到许多好文章对我很有启发，这也是“启蒙”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无法完全控制，给群众性的启蒙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条件。我不太喜欢“意见领袖”的说法。当然，“闻道有先后”。有些人先了解了真相，先作了深入的思考，想通了一些问题，有责任与大家分享，消除流传的误区，如果说所谓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大概就是指这个。

其次，启蒙不能“定于一尊”，某些人自以为是权威，掌握真理，不容别人质疑，这样又会进入新的蒙昧。只要是基于事实真相，凭借理性的独立思考得出的看法，都应该充分表达，互相交流，甚至争论，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启蒙时代”，不过前提是大家都有平等的、充分表达的机会。目前这还是理想，不是近期就能实现的。

再者，启蒙不能作为一种运动。只要每个人凭良心，无论你相信什么信念，只要是真诚的，不是为了媚上，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大家在无形之中照亮自己的心灵，传达推动文明进步的、更加接近人性的思想和观念，并相互启发，这就足够了。

此外，启蒙并不是万能的，有的是因为你没想到，无知的缘故；有的是利害关系。我觉得中国的成语真的是非常智慧，有个成语叫“利令智昏”，一心逐利的时候，人的心智会受到蒙蔽，对明摆着的事物视而不见。

二 历史、传统与精神

张：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有几个，但是，像我们这样如此重视历史文本，强调史家传统，并赋予史书如此沉重使命的却没有几个。一种最为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对于这种说法，您是怎么看待的？另外，您一直主张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从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反对对人麻木的历史观。于此，您能否结合历史，谈一下什么是以人为本的历史观？

资：“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呢？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给“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

中国的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他生活的时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的《武帝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写列传。还有酷吏、廉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怀抱，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都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是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作者虽然也姓司马，但司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他在《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按：这部通史写了19年，当然有一些助手，所有助手的名字也在上面，包括校对的、刊印的，但是司马光是主要编撰者），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

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实现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统治。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的，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因为孔子维护的是正统的秩序，不容犯上作乱。例如，臣杀君，叫“弑”，君杀臣叫“诛”。前者是大逆不道，后者是罪有应得。

大家应该都知道文天祥的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说春秋时期有两个能坚持原则、坚持说真话的史官，齐国的太史简因为大臣崔杼把齐庄公给杀了，在史书上写：“崔杼弑其君”。崔杼说不能用弑字，他坚持用，就被杀了。那时候职位常是一家继任的。他死后他弟弟接手他的职位，也坚持用弑字，结果也被杀了，另一个弟弟再接替这个工作，照样坚持用“弑”字，也被杀了。三兄弟前赴后继，就为了这一个字。最后崔杼手软了，觉得不能再杀下去，就认了。所以在《春秋》里记载的是“崔杼弑其君”。这件事说明：第一，他们非常在乎用哪个字；第二，当时的人还是有血性的。他们认定的原则，不惜以身殉职。据说另外还有一个别姓的南史氏，听说此事后还准备去接着干，去撞刀口。后来崔杼罢手了，他才没有去。那时候的人确实较真儿，把坚持他们认定的真理看得比性命还重。我们今天的是非标准和那时不同，看起来很可笑，为了用哪个字而牺牲性命。但他们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是他们的道统。晋国董狐的事迹也差不多，不过没有被杀，就不细说了。通常有“殉国”“殉职”“殉道”之说，而写历史成为一桩惨烈的职业，要牺牲性命，“殉史”应该算是中国特色。无论如何，这两位史官为后来写历史的人树立了一个标杆，中国古代修史以此为榜样，坚持写真事，不能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而瞎编，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历史都是史官写的，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史官。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也许就是从齐太史之后立下的规矩（我没有考证），君主本人不能看史官如何记载他的言行，这样，史官就可以无顾虑地如实记载，为后世提供真实的史料。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的就逐渐多起来。不过总的说来，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

另外，除了官史之外，还有许多野史、私家编撰的见闻录。例如宋周密撰《齐东野语》的序言说：“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唯我家历史不可易”，因为官史受当时的政治斗争影响，有私心、有党争，常是以得势者的是非为是非，只有他们家祖辈传下来的实录是可靠的。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在明清以降大兴文字狱之前，这种民间野史的刻写、流传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写前朝历史，不涉及本朝利害，可以客观一些。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包括广为搜罗的野史，甚至民间传说。而且史官们特别希望当朝皇帝能吸取经验教训，不能自欺欺人，因此也有写真实的动力。赞扬前朝的开国皇帝，揭露过去亡国之君的弊政，都不会冒犯当今的在位者。所以，为我们留下的二十四史，还有相当的可信度。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显然，这里的出发点是救国，不管是学习中国史还是学习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这也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历

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的。比如你要学英国历史，你得看 13 世纪的《大宪章》，有了这个之后，就是克伦威尔革命，以后又有光荣革命，又有工业革命，等等。而不是以斯图亚特王朝或都铎王朝怎么样了为线索。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日本“明治维新”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这样，不知不觉引进了另一种历史观。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号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能总盯着皇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器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等。而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制度的变迁成为手段。这就倒过来了：不是说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是为了巩固当权者的统治，而是说为了国家繁荣、人民福利、社会进步，什么样的政府和什么样的制度是合适的，不合适就被“替换”。

2005 年，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崛起”，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19 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这就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起》这部记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其原因当然在于“以俄为师”的历史根源，这点众所周知，不必细说。在总结苏俄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众说纷纭之中，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1. 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是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他们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苏联的军队坚持枪口不对内，是文明之师。被谎言屏蔽的历史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苏联档案开放成为全世界历史学家的盛宴。方今俄罗斯出版了许多历史书，基本上颠覆了《联共（布）党史》，证明该书大部分是为树立斯大林个人，为其专权辩护的谎言。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各民族获得了一次新生。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2. 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几千万党员不站出来誓死保卫党权，其原因是信仰不坚定，思想自由化；叶利钦是叛徒；手握重兵的武将按兵不动，不作平叛勤王之举，是懦夫。于是当初自称布尔什维克的一群人通过暴力夺取的“江山”给拱手让出来了。从这一角度出发，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而且在必要时不惜用军力保卫已经占有的统治权，在这里，亿万广大百姓的实际福祉和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计。

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的理由的根本认识。百姓是主人，还是在皇恩浩荡下的臣民，各级政府官员是“食君之禄”，还是纳税人养活？这“谁养活谁”是问题的根本。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祖辈打江山，子孙

坐江山、保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现代民主、共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远未深入普及，却又经历了以人民的名义行高度集权的历史。现在要把观念扭转以“民”为目的、政权为手段，十分困难，况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而是面向大众的。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写真相的历史。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被编造或屏蔽的历史，其作用适得其反，是愚民的手段，可以“使人愚昧”。

张：记得您曾在一篇非常著名也非常有影响的文章中，从历史与道统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的“士”或者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那么，您能否简要谈一下“士”的精神内涵是什么？这种“士”的精神传统又有什么突出的特点？

资：对于“士”的精神内涵，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我自幼承庭训，读一点《论（语）》、《孟（子）》，印象最深的几句话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等等。这些话，总的精神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独立的人格”。另一方面，不满足于消极的洁身自好，而是对国家、民族有高度的责任感。有时退而“独善其身”是不得已的，内心的抱负都在“兼济天下”。这种精神包含了中国读书人最看重的“骨气”和“担当”两个方面。保持人格独立，如果没有外界压力，十分容易做到，也就无所谓坚持了。在中国几千年的特定条件下，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甚至以命相争才能守住的。压力不言而喻，首先来自权势，所以“坚持”的另一面就是不畏权势，从孟夫子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我得志弗为也”，到魏晋名士的特立独行，都有藐视王侯、不畏权势的特点。来自另一面的压力是“俗”，要“坚持”就必须不随俗、不媚俗，不与“潜规则”同流合污。在上下左右的夹缝或夹击中坚守自己的“志”，保持人格完整，心灵自由，方显其风骨之可贵。这种“风骨”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中国的“士”的精髓。

张：您所看重的这种“风骨”，是不是就是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所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资：是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那样：“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实际上也是“士”的精神传统中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

当然，我们也知道“士”的精神传统是在特有的历史轨迹中形成的，既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追求，也有其自身的突出特点。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点：

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其依据的现实条件是“学而优则仕”。能有资格“忧国”的，大小都做过官。即使暂时不“居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还是有官职，而不是“庶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有一定的“位”，不是草根百姓。尽管皇朝是一家的天下，在朝的大臣还是视同己有，因为舍此无以安身立命。

二是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意把“天下”和“国家”分开，他明确说“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那是因为朝代更迭他无能

为力，只能努力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体系。当然，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

在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但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士”一旦入朝，成为“大夫”，潜意识的还是继承了“贤者为帝王师”的想法，以“致君尧舜”为己任，还是努力企图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他们心目中有“明君”和“昏君”的评判标准，历代官吏也尊崇“直臣”，蔑视“佞臣”，不少当红的宠臣位高权重，却为同僚士林所不齿。文天祥在殉难前想到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不是宋太祖或其他什么皇帝的训诫。耿直之士“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因为自以为真理在握，有这份自信。所以，尽管有杀头、灭族的危险，面折廷争、冒死直谏之士代代不绝。另外，君臣都重视身后名，对“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很在乎。这一点也是坚持原则的动力之一。

在学术层面，由于有一定的独立性，较少受皇权的干扰，即使在“注六经”中也还能形成不同的学派，特别在唐中叶以后，书院兴起，至北宋蔚为大观。无论在朝在野，学者和书院对道统的传承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还能发展出疑孔、非孔之学。另外还有一条隐逸之路，在“邦无道”或自己想远离“帝力”时，还可以归隐田园，保持一定的精神独立，并创作出无比丰富的、灿烂瑰丽的文学艺术珍宝。“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千古名言，深入人心，不论是否能做到，却在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三是“颂圣文化”，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出自韩愈《袁里操》。韩愈是最正统的儒家道统维护者，也应当是直言敢谏之士，明知皇帝好佛，偏要上《谏迎佛骨表》，遭贬黜也在所不辞，“肯将衰朽惜残年”！他以同样的忠诚作《袁里操》，想象当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时的心情，写出了这句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周文王代表了儒家所向往的最理想的天子，他坐牢时也有《歌》传下来，注家有不同解释，此处不论。可韩愈觉得他应该抱这样的态度。这种发自内心的绝对服从，其伦理的依据就是儒家的“三纲”，现实的基础则是人身依附。因为在那种制度下，读书人除了“报效朝廷”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用其学。冒死直谏，犯颜上书，都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哪朝哪代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连“腹诽”也是罪。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值得一提的是，自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也于此开始。这一探索持续百年。由于面临的问题与以前完全不同，“亡国”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与“灭种”联系起来，那时所谓“灭种”，不是真的如希特勒杀犹太人那种“种族灭绝”，而是指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所以，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探索也空前活跃。在精神上，传统因素还有一定的作用。上述忧国忧民的担当与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在谭嗣同、秋瑾等烈士乃至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不过他们不是为维护原来的“道统”，而是力图打破它，朝廷和国家已经不是一回事，而是为救国必须推翻朝廷，至少要彻底改造之。这种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三点“颂圣文化”。这也是“新文化”的精髓。从严复的“开启民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而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传统的，而所承载的观念和思想则是新的，从外面引进的。这是一场持续的启蒙。如果说，中国曾经

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半，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现在常为人们所称道的“西南联大”那些人和事可以为代表，当然不止“西南联大”，还有“中研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学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现。那时政府也是专制，也有高压，甚至还有暗杀，但是总体上，知识精英还是保持了气节和一种价值共识。张奚若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就拂袖而去，下次开会可以退回差旅费，拒绝参加；马寅初公开揭露孔祥熙，把他骂下台，直到 1947 年已是内战方酣之时，傅斯年公开发表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半个月后宋子文就被撤职。1940 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最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精神的结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先生起草回绝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内容是据理批驳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贯穿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掷地有声。信中特别指出，如果按此规定办理，大学将等同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大学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将不如科员，受到轻视。结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顶回，学校保持了独立。这里讲的就是一种“士”的精神。

如果以上面所说的“士”的三点传统来看当代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伏，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毋庸讳言的是，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算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也有些人认为，那些特立独行之士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在主流文化中，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既颂个人，又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出的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

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吏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史、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张：确实如此，古之“颂圣”，实际上也包含有对某种纲常的认同和坚守。就比如说，您在一篇文章中对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所做的剖析。您认为，虽然他们各自都是殉身于“道”，但是所殉之“道”却完全不同。

资：是的。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朱允炆（建文帝）的老师。他后来坚拒为造反夺位的燕王朱棣（永乐帝）起草登基诏书而慷慨赴死，不但被“磔于市”，而且“灭十族”——连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也受株连，其“扩大化”可谓空前。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由衷敬佩。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 1402 年。过了近二百年，意大利人布鲁诺以传播异端思想于 1600 年被罗马教廷处以欧洲当时的极刑——烙刑。他在狱中七年，援引教义为自己辩护，只是坚决不肯接受他可以获得赦免的唯一条件——否定“日心说”。其捍卫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永为后世所称道。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临刑前他的舌头被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不过好像古代欧洲没有株连之律，所以他只一人遇难。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过，就抽象的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布鲁诺为之奋斗的，可以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动一步，而方孝孺为之牺牲的却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弟弟应该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都不是改朝换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方孝孺和布鲁诺的差别，实际上也是他们所根植之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们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这一历史轨迹到了晚清终于给打乱了，中国近代史从此开始。

三 美国、新冠肺炎与青年

张：您的专业领域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如今，中美关系再次走到重要拐点，面临重大考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把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想尽办法阻挠中国的经济发展。近日，继华为事件之后，又以危害国家公共安全的名义对中国的微信、TikTok 进行围猎和打击。于此，您能否从专业的角度，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影响未来走向的因素做一些简要分析呢？

资：这些年，尽管中美关系起伏不定，但是影响两国接近或疏远的主要因素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当然，有些变化是随着更大的、全球性的、国际背景的、大国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譬如，苏联的“威胁”是当时促使中美两国关系共同迈出关系正常化第一步的一个战略考虑，现在不复存在了。我从来不对一个顺畅和亲密的两国关系抱有任何幻想，也不担心这种关系会恶化到迎头相撞的地步。过去我一般对双方领导人的理性思考还是有信心的。但现在看来，有一些新的现象使我这一信心动摇，产生新的忧虑。

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有的国家看来，这是对现行国际秩序和霸权

平衡的一种挑战。我对这种观点并不感到惊讶。在我看来，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摩擦是经常发生的，并非什么不正常的现象。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如 WTO 等现行国际机制找到有效方案，来解决它们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美之间的问题埋藏在它们各自不同的发展进程之中，双方因为缺乏互信而被想象出来的并非真实的利益冲突所误导的危险是存在的。

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人的感情很复杂，既有恐惧，也有嫉妒。尽管头脑清醒的人都清楚两个国家实力之间还存在的真正差距。长期以来，对华政策始终是美国国内政治竞争的一个牺牲品。现在，当美国遭遇了自己的经济困难，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可能再次方便地成为替罪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初期，中国的地位是符合弱势的位置，而且中国所进行的改革是朝向美国欢迎的方向。现在，情形发生了变化，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方面，因为国家 GDP 在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尤其是这种增长发生在美国和欧洲遭遇经济下滑和金融危机的时刻，导致了某种骄傲自大的心态，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间，这些人往往或无视国内存在的许多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各方面落后，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但是，现在心态变了，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般”的成长证明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对于当前所有因不公正和治理失败引发的公众不满和社会动荡来说，也有一个很便利的替罪羊，这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挑动和怂恿，美国往往首当其冲，被认为是这些抗议行动的主要支持者，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秘的。此外，抛开美国在海外的霸权不论，美国政治体制中的缺陷，如它的国内经济和政治丑闻所暴露的，也引发人们对美国主体制的优越性和普世性的普遍怀疑。中国的自由派过去将美国作为一种高度文明化的民主国家模式，此刻却发现他们在国内反民主制的思潮面前，其发言权被削弱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遵循邓小平一贯的思想，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政策是谨慎的、有理有节的，是基于对形势和双方利益的客观评估之上而做出的。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被高估了的实力，非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可能会更加容易地得以传播，上下交相影响，一时间在舆论中发酵，对外传递混乱的信号，引起国际反弹，给“中国威胁论”添火，特别是在中美之间造成恶性循环，这是人们在评估影响未来中美双边关系的因素时需要加以考虑的新现象。

不用说，在未来数十年的时间内，中美关系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话。世界和平，甚至可以不夸大地说，人类的福祉都将依赖于这种关系发展的轨迹，无论它是好是坏。没有任何一个理智的人愿意看到双方走向敌对的状态。良好的关系必须基于相互准确的了解之上。在这个方面，对于两国的严肃研究，包括历史与文化在内，是很必要的。中国将再次处在转型的关口，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次转型的方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乱象丛生，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深度变革的时刻。未来中美关系也许将取决于双方在内部改革的成就如何，而不是它们在各自的外交政策如何。在两个国家进行根本性内部变革之前，所谓的“一种持续的相互欣赏的关系”是难以实现的。

张：当前，新冠肺炎依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虽然我们国家的抗疫之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形势也不容乐观，一刻也不敢放松。抚今追昔，很多人想起了 13 年前的那场“非典”的肆虐，因为二者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都暴露了我们国家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以及公共卫生防疫等方面的不足和缺陷。那么，您能否结合当年的“非典”和今年的“新冠肺炎”，谈一下我们应当如何应对类似事件呢？

资：不管是 2003 年的“非典”，还是今年的“新冠肺炎”，都是突然袭击，然后迅速泛滥成灾，最终得到遏制。我觉得，在应对类似事件时，有必要回归到“五四”的精神传统中，回归到“赛先生”与“德先生”那里去。

这里先说科学。当然医学是科学，不过这里科学的含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指科学知识或技术水平。科学精神就是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追求真理。把“真实”

放在一切其他的考虑之上，例如政治影响、“国家形象”、领导“面子”、部门利益、经济收入、个人仕途等。在我国，“真实”常常要服从于上述种种考虑，特别是所谓“政治影响”。这是长期以来的政治生活培养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从基层到高层各级官员都习以为常，几乎成为本能。一发生天灾人祸，首先考虑对外“口径”如何掌握，而不是穷追真相。现在追究究竟是下级对上级掩盖真相，还是上级给下级规定公布口径，或是真相停留在哪一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长期的“泛政治化”思维腐蚀了科学精神。什么时候我们的各级官员能完全以科学的态度单刀直入地回答问题呢？

关于民主，基本要素之一就是“知情的公众”（informed public）。愚民政策显然与民主不相容。特别是在一个需要每一个公民自觉地与政府合作的疫病危机中，把公众蒙在鼓里，如何行得通？这一态度既不科学也不民主，已经造成了惨痛的后果，而且事与愿违，国家形象、政治影响、政府的可信度恰好因此受到严重损害；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对于坏事总是宁肯信小道而不愿信政府公开发表的消息。这是一种“狼来了”的心理状态，追根溯源，怪不得老百姓。唯一的治疗之道，只有坚持不懈地说真话，假以时日，必见成效。

照理说，医生应该是最讲科学的。医生的首要职责是对病人负责，在流行病面前的首要职责是控制其蔓延。这既是医生的责任，也是权利。但是我们的医生被剥夺了科学对待疾病的权利，他们被要求遵守“宣传纪律”，似乎他们首先是对上级行政领导负责。科学和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服从于这一“纪律”。SARS 期间第一个冲破这荒唐的“纪律”讲真话的医生是蒋彦永，他立了大功，却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现在已几乎被人遗忘。这回的李文亮医生，先被压制，自己也感染而献出了生命后，在民众心目中成为英雄，当局补给迟到的荣誉。但是如果当初他的警觉能得到一名医生的正常对待，疫情的形势可能大不相同。希望这种悲剧不要一再重演。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蒋、李医生的勇气的确值得钦佩；人们不禁要想，如果是在一个把科学和人道放在第一位的氛围中，医生说疫情需要冒这样的风险，以至于只有非凡勇气的人才做得到吗？艾芬医生那句“老子到处说”为什么会瞬间被中国网民几十种文字传播？难道还不能看出民众对不讲科学、违反人道的“纪律”的深恶痛绝吗？但愿今后出现类似的情况会有更多的医生无视这种“纪律”，大声疾呼。当然，医生们一定有苦难言。以后怎样才能鼓励凭良心说真话，造成风气呢？这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与历史上历次瘟疫不同，这两次的疫情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这既造成了疫情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又提供了全球通力合作围剿病毒的空前有利条件。

中国以举国体制，后期遏制了疫情传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值得庆幸。但是现在就唱赞歌还为时过早。第一，各方专家都一再警告，疫情尚未过去，有可能卷土重来；第二，武汉早期延误的经验教训尚未得到认真的总结，李文亮等医生不能白白牺牲；第三，由于早期的失误，武汉以及湖北人民遭受了多少不必要的牺牲和苦难，这些都未能得到关注和统计；第四，“中国模式”的抗疫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其长期后果还有待时日方能做出客观估价。最后，我比较担心的是在宣布疫苗成功方面，也仍然出于政治考虑而忽视科学规律，其长远后果难以估量。

总之，正如我在 17 年前 SARS 期间的文章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不可抗拒的天灾面前，千百万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科学和真相应该放在政治考虑之前。这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各国国情不同，抗疫的方式不同，我们得到的信息也常与身在其中的人的感受有差别。所以我一般不对他国的抗疫做出评论。不过根据我目前的认知，不得不说的是，美国的抗疫表现实在与其超强实力、先进的医疗水平和丰富的资源不相称。人们可以给出种种主客观原因，我认为至少主要原因之一恰好就是受政治影响。正好今年是大选年，应该领导抗疫的负责人从一开始就对科学和医学专家的意见缺乏尊重，把政治、选情放在一切考虑之上。

此外，从整个国际社会来讲，此次蔓延全球危及人类的病毒本应促成超越国界和狭隘利

益的国际合作，但是这次的疫病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过于政治化，从开始的信息共享到后来的药物和疫苗的研制，都因政治因素而妨碍本该有的精诚合作。这是人类的不幸。这其中谁该负什么责任，只有待历史评说。我们一般老百姓只有努力科学地生活，保护好自己，免遭劫难。

张：您在书中也提到，“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青年人。”那么，您希望现在的青年人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应当怎么做？

资：首先，我希望青年朋友们能够凭良心做事，守住一个底线，尽量不要与坏风气、恶势力同流合污。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处境是比较优越的，作为退休老人，可以免受工作中的种种压力也没有养家的生活负担，温饱有余。所以我不能够站着说话不腰疼，对现在正在为生活而挣扎的中青年人要求太多，但是我就觉得起码你们应该做到守住这个底线。假如为了守住底线而需要牺牲掉一些某种利益的话，也应该有所准备。好在现在与以前不同，由于坚持原则而在一处不见容，总还有可以另谋出路的空间。当然我不是提倡做烈士，尽管我非常崇敬敢为天下先而舍身饲虎的人。其实守住底线，不作恶，不一定就要做出多大牺牲。根据我与体制内各个岗位上的人打交道的经验，只要没有特殊的野心，有敬业精神，就可以做好事，出成绩。我还发现，凡是不想升官，或已经没有升迁机会的人，反而比较敢负责任，能按常理办事，凭常人之见，做出积极贡献，在不得已时，也能枪口抬高一寸。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攀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之所以意志薄弱，跟攀比特别有关系。家里有钱的大学生过生日花好多钱请大家吃饭，经济情况差的就觉得要过生日不请客的话很丢脸。还有追求名牌等等，什么算是有面子，什么算没面子，这是很腐蚀青年的东西。其实完全是不必要的。假如能够抵制这类虚荣，就比较容易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再对社会有所关怀。现在其实有不少有志青年在各个领域努力对社会有所贡献。有需要的地方总有热心的志愿者，虽然做志愿者在中国也是要碰到很多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挫折，比别的国家的青年要有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坚韧、更加坚强一些才行，这一点也要有心理准备。

张：好的。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精神愉悦，思想之树长青！